

文本比较

一部缺失“开化”的“开化史”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与日本文明史学之困境

□ 黄东兰*

一、引言

田口卯吉(1855—1905年)是近代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言论家和实业家,受英国古典经济学说的影响,他毕生倡导自由贸易,被后人誉为日本的亚当·斯密。^①在近代日本史学史上,田口卯吉与福泽谕吉并称为文明史学的开拓者。

文明史学,时人大多称之为“开化史”,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欧洲启蒙史学影响下出现的史学流派。^②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的浪潮中,西方的新知识、新学说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社会进化学说。社会进化论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而当时的欧洲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点。福泽谕吉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之概略》中,将人类历史分为野蛮、半开和文明三个阶段,欧

*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

① 田口的传记主要有如下几种。田口卯吉:《自叙传》,1899年,田口卯吉全集刊行会编:《田口卯吉全集》第8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28年初版,1990年重印本。盐岛仁吉编:《田口卯吉先生传》,东京:经济杂志社,1912年。福田德三:《解说》,《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田口亲:《田口卯吉》,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河野有理:《田口卯吉的梦》,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3年。

② 本文在行文中按照学界惯例使用“文明史”或“文明史学”;在涉及田口的文明史著作时,名从作者,沿用“开化史”。

洲和美国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土耳其、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为“半开”,非洲、澳洲等地则尚处在“野蛮”阶段。^① 福泽的《文明论之概略》传播了一个源自西方的信念:人类历史背后蕴藏着一个普遍的“进步”法则。对人类“进步”法则的信念,催生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史学流派——文明史学——的诞生。

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年、1883年东京书林合刊本),是近代日本文明史学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该书第一卷问世时,田口年仅22岁。《日本开化小史》使田口声名鹊起,掀起一股文明史热潮。^② 几年后,田口又撰写了《支那开化小史》(1883—1888年,东京:秀英舍合刊本,1888年)。^③ 这部以“开化”命名的中国历史,在甲午战争后受到了清末留日学人的关注。1899年,梁启超在东渡日本的第二年撰写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对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称赞田口“目光如炬,善能以欧美之大势,抉中国之病源。诚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梦也。汉以前尤为精绝”^④。在世纪之交的“新史学”热中,日本出版的许多文明史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也由上海广智书局于1902年翻译出版,书名改为《中国文明小史》。^⑤

然而,通读田口的两部“开化史”著作,不难发现,二者虽然同为“开化史”,但主题、风格迥异。《日本开化小史》对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在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方面的“开化”(即进步)内容皆有详细叙述,江户时代更被作者誉为“灿烂开化之时代”。反之,在《支那开化小史》里,人们不但看不到经济社会之发展,连曾经被江户

① 福泽谕吉:《以西洋文明为目的》,《文明论之概略》第2章,《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59年,第16页。

② 如北川藤太:《日本文明史》,北川藤太刊行,1878年;藤田茂吉:《文明东渐史》,东京:报知社,1884年;物集高见:《日本文明史略》,东京:文部省编辑局,1886—1887年;羽田尚德:《大日本开化史》,青木辅清刊行,1888年;青山正夫:《支那文明史略》,松村九兵卫刊行,1888年;那珂通世:《支那通史》,东京:中央堂,1888年;市村瓊次郎、泷川龟太郎:《支那史》,吉川半七刊行,1888年。

③ “支那”为“China”一词的音译,明治以后才大量出现于报章杂志。它淡化了“中国”“中华”“汉土”“唐土”等名称所含的对中国的敬畏之意。关于明治时期“支那”一词的含义,参见斋藤希史:《汉文脉之近代》,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5年。笔者在《书写中国——明治时期日本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中国表述》一文中对“支那”一词也有探讨,见黄东兰主编:《再生产的近代知识》,《新史学》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④ 梁启超:《东籍月旦》(1899年),《饮冰室文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00—102页。

⑤ 《支那开化小史》中文版由上海广智书局于1902年出版,更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刘陶译。《日本开化小史》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42年出版,余又荪译。关于日本文明史、开化史的著作在清末的译介情况,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83页。

时代的儒者们奉为圭臬的礼乐刑政和文物典章也都忽略不表。在田口的笔下,中国历史不过是一部“专制政治”的历史。同为“开化史”,何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田口卯吉作为近代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文明史学的开创者,在日本学界受到高度评价。有关田口史学的研究为数众多,但大多集中于《日本开化小史》,相比之下,《支那开化小史》则很少被人关注。^① 河野有理在最近出版的田口卯吉思想传记中,援引田口同时代人对《支那开化小史》的评价,认为该书没有涉及衣食住行、文化风俗等内容,是田口的“失败之作”。^② 据笔者所见,仅有武藤秀太郎《田口卯吉文明史论的转变与“中国的冲击”——日本的东方主义再考》一文注意到田口两部“开化史”在历史叙述上的矛盾。作者指出,《日本开化小史》是一部日本的“进步”之史,但是,田口在《支那开化小史》中背离了他的历史哲学,将中国历史描写成一部“停滞”的历史。武藤从分析田口的经济思想入手,剖析了田口对中国的认识的问题所在。根据武藤的研究,在田口撰写《支那开化小史》期间,日本正面临一个重要的经济抉择,即是否应该在东京湾修筑港口的问题。田口从他一贯主张的发展自由贸易之立场出发,认为东京为了与上海、香港等中国东南沿海的良港争夺贸易地位,必须建设东京港。武藤认为,田口对中国历史“停滞”不前之认识,乃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实力的此种现实把握,并非单纯来自西方近代的“文明—野蛮”学说。^③

文本既是作者生产行为的产物,也是读者再生产行为的产物。《支那开化小史》这部一个多世纪前诞生于日本的中国通史著作,究竟传递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何种认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迈入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之路,当日本知识人在书写日

① 满井隆行 1966 年发表的《明治时期的中国史教科书——以〈支那开化小史〉为主》一文,是笔者所见的以田口《支那开化小史》为题材的唯一一篇论文。作者认为《支那开化小史》比后来受德国历史主义史学影响、重视史料考证和排比、缺乏热情的中国史著作“更有教育意义”。满井隆行:《明治时期的中国史教科书——以〈支那开化小史〉为主》,《茨城大学教育学部纪要》第 15 号,第 119 页。

② 前引河野有理:《田口卯吉的梦》,第 77 页。

③ 武藤秀太郎:《田口卯吉文明史论的转变与“中国的冲击”——日本的东方主义再考》,社会思想史学会编:《社会思想史研究》第 28 号,2004 年 9 月,第 144—145 页。张昭军《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一文也分析了田口的中国认识。作者在比较田口和梁的史学思想后指出:“田口著《支那开化小史》意在以中国为例说明专制政治之害,为日本人树立负面形象。”“福泽、田口等人的文明史研究由批判儒教史观,演绎为丑化中国形象,甚至为军事扩张提供理论工具。”张昭军:《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第 73 页。

本“进步”之历史时,究竟如何定位中国这个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给日本带来重要影响的国家?田口的中国史叙述与日本史叙述之间有何种关联?这些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都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将通过勾勒田口从19世纪70年代接受文明史学到19世纪90年代告别“开化史”之思想演变过程,并着重比较田口两个“开化史”文本在内容和叙述策略上的相互关联,对上述问题提出作者的解答。

二、田口卯吉及其“开化史”思想

田口出生于江户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田口的曾祖父佐藤一斋(1772—1859年)是江户后期著名的儒学家,曾担任德川幕府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的教授,渡边华山、佐久间象山、中村正直等俊秀曾投其门下。田口的祖父慎左卫门是一斋的长子,本该继承家学,但因“生性刚烈,好武厌文”,一斋将其入赘给下级武士田口家。^①田口卯吉早年坎坷,他5岁丧父,家境贫寒,但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12岁就读完了武士教育的基本课程——四书五经,还参加过昌平坂学问所每年一度的素读吟味考试(即汉学基础考试)。^②幼年的田口卯吉所处的是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由4艘黑船组成的舰队驶入江户湾,要求德川幕府开港通商。次年,培里舰队再次到来,幕府被迫放弃持续200余年的锁国政策,与之签订《日美和亲条约》。幕府的政策受到了国内攘夷派的强烈反对,1867年,以萨摩、长州二藩为主力的倒幕军击败了幕府军队,德川幕府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将政权“奉还”天皇。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是年,田口13岁。

此后的大约20年间,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文明开化”时代。新政府推行废藩置县,废除了封建制度;颁布学制和征兵令,推行近代教育,训练近代化军队;兴办铁路、电信、造船、矿山,建立了资本主义工业。短短几十年间,便跨入了列强的行列。但是,明治维新并没有给所有人都带来“文明开化”的时代利益,改朝换代使幕府家臣们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虽然将军德川庆喜以放弃抵抗为条件,换取了明治政府对幕臣们的宽大处理,但是,田口这一代曾经抵抗政府军的“朝敌”之后,再也无法像其祖父辈那样世袭职位和俸禄,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寻找人生的机会。

① 田口卯吉:《自叙传》(1899年),《田口卯吉全集》第8卷,第82页。

② 田口卯吉:《告每日记者》(1899年),《田口卯吉全集》第8卷,第87页。

1868年,田口一家迁往横滨,靠母亲和姐姐做小买卖勉强糊口。田口一边在古董店当伙计,一边跟美国传教士学英语。英语成为他打开人生希望之门的钥匙。次年,田口进入德川家在静冈开办的沼津兵学校学医。18岁时,田口凭着扎实的英语基础考入大藏省翻译局,谋到了第一份工作。两年后,翻译局被撤销,田口被调入大藏省纸币寮,继续从事英文著作的翻译。为了补贴家用,他开始翻译《大英商业史》《麻氏经济哲学》等英文著作。在这一时期,田口接受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经济理论,此后,他毕生提倡自由贸易,反对明治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1878年,23岁的田口辞去大藏省的工作,于次年创办《东京经济杂志》,成为言论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两年后,田口当选东京府会议员。1894年,他又当选众议院议员,直至1905年病逝。田口一生还从事过许多实业活动,他曾参与东京证券交易所和铁路公司的经营,还一度参与南洋开拓事业。在田口后人捐赠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资料中,有田口和田中正造、尾崎行雄、嘉纳治五郎、西园寺公望、犬养毅、森鸥外等著名人物往来的书信。^①经历改朝换代之后,幕府家臣的众多子弟沦落颠沛,而把握到“文明开化”时代脉搏的田口,先是凭借英语能力成为一名译介西方学说的“洋学者”,进而又成功地进入言论界、实业界和政界,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名流。

田口自幼就对史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在沼津兵学校求学时,他曾在著名汉学家中根淑的私塾里学习《庄子》和《左传》等汉文典籍,课余喜好阅读《日本外史》和《十八史略》。在大藏省翻译局供职期间,田口除了学习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著作外,还研读了基佐的《欧洲文明史》,^②这为他后来撰写两部“开化史”打下了基础。

与明治时期广为流行的许多词语一样,“文明”和“开化”这两个词都来自中国古典文献。“文明”源出“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开化”源出“开物化民”(由“开物成务”[《易经·系辞传》]和“化民成俗”[《礼记·学记》]结合而成)。明治知识人则赋予“文明”和“开化”新的含义。论者在言及明治时期日本的“文明开化”时,往往将“文明”与“开化”视为同义词,很少注意到这两个词在用法

① 和田敦彦:《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田口卯吉关系资料目录——作为档案教育之一环》,《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研究》(国语·国文学编)第58号,2010年。

② 田口在大藏省翻译局供职期间,主要修习英文,基佐《欧洲文明史》的英译版是教材之一。学生们事先预习后在课堂上轮流讲读,理解错误之处由教师一一纠正。前引田口亲:《田口卯吉》,第56页。

上的区别。“开化”一词在日语中的基本含义是“通达”“开通”“敞亮”。在江户末期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年)中,“开化”对应英文的“polish”一词,意指“完美”“优雅”。在明治四年(1871年)出版的《法和辞典》中,“开化”对译法文“civilisation”。在10年后出版的《哲学字汇》中,“开化”首次成为英文“civilization”的对应词。与此相比,“文明”一词在辞典中出现较晚,最早见于明治元年(1868年)出版的《新令字解》中,意为“出色”“精湛”,这是日语中“文明”一词的基本含义。直到明治十八年(1885年),“文明”才作为“civilization”的对应词出现在《学校用英和字典》中。^①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1868年)中有“考察历史可知,人类始于莽昧,渐趋于文明开化”^②一句,这是将“文明”与“开化”组合成“文明开化”,对应“civilization”的最早译例。大致而言,在明治时期,“开化”指迈向“civilization”之过程,而“文明”则多用以形容“civilization”之状态(如“文明国”)。

在明治初年的报章上,“开化”出现的频率也远远高于“文明”。例如,吉野作造编纂的《明治文化全集》第12卷《文明开化篇》(日本评论社,1929年)中,收录了15篇明治初年的文章,内容包括着洋装、食牛肉、改阴历为阳历、发行纸币、征募士兵、征收租税等诸多方面。有11篇文章的标题里出现了“文明”“开化”或“文明开化”字样,其中用“文明开化”的有3篇,用“文明”而不用“开化”的仅1篇(《文明乡间问答》),用“开化”而不用“文明”的则有7篇(如《开化入门》《开化问答》《开化本论》《日本开化诗》)之多。田口卯吉的两部文明史著作以“开化史”而不以“文明史”为标题,与明治时期“开化”一词的流行正相吻合。

明治维新后,在日本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西方学说莫过于社会进化学说。欧洲启蒙时期形成的关于人类发展遵循“进步”法则之观念,主要是通过斯宾塞的著作传入日本的。在明治维新的最初20年间,斯宾塞的著作被译成日文的多达20余部,包括《斯氏教育论》(尺振八译,1888年)、《社会平权论》(松岛刚译,1881年)、《社会学之原理》(乘竹孝太郎译,外山正一校阅,经济杂志社,1885年)、《社会学》(大石正巳译,是我书房,1883年)、《万物进化要论》(杉本清寿、西村玄道译,民德馆,1884年)等等,这些著作成为明治知识人接受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等新观

① 惣乡正明、飞田良文编:《明治语言辞典》,东京:东京堂,1986年,第51—52页,第520—521页。

② 福泽谕吉:《西洋事情》(1868年),《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395页。

念的重要途径。^①

在史学界,有两部著作最受时人推崇,一部是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另一部是英国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②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是作者系列讲演的记录,讲述了从罗马帝国崩溃到18世纪欧洲主要国家政治演变的历史。该书贯串着一个主题:欧洲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巅峰,而法国文明又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基佐认为,欧洲文明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多样性,它包含了神权制、君主制、封建制、贵族制、民主制等社会制度的多种形态与原理。多种社会力量之间相互竞争,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都未能制服其他力量。由竞争带来的活力使欧洲历史从未停止其前进的步伐。^③与侧重政治史的《欧洲文明史》不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从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对社会的影响。巴克尔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因为历史学家还未能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规律。历史学家不应该只关心英雄、伟人的事迹,而应该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科学技术等构成“社会”之诸多方面。他比较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后指出,欧洲文明的特征是人的力量胜于自然,在欧洲以外的文明中,则是自然的力量胜于人。“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国民在获取自由方面的进步。因此,真正的文明只能出现在欧洲。”^④

据田口传记的作者、长期师事田口并追随其左右的盐岛仁吉回忆,田口对基佐和巴克尔的文明史著作十分推崇,曾说“开化史体乃史体中最进步者。堪称开化史者,仅巴克尔、基佐等数人而已。此外别无可称文明史者”^⑤。显然,巴克尔和基佐的著作是田口心目中“开化史”的典范。

虽然明治知识界有“谈史则曰勃克尔(巴克尔),论社会法则曰斯边撒(斯宾塞)”^⑥之说,但是,当他们把目光从基佐和巴克尔的文明史著作转向日本的史籍时,便失望地发现,上自奈良、平安时代大和王朝钦定的《六国史》,下至江户时代的两部日本通史著作《本朝通鉴》和《大日本史》,以及水户藩正在编纂的《大日本史》,

① 清水几太郎:《孔德与斯宾塞》,《世界名著》第36卷《孔德 斯宾塞》,东京:中央公论社,1970年。

② Francois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 Paris: Perrin, 1855.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West Strand, 1856-1861.

③ 基佐:《欧洲文明史》第2讲,沉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④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 1, the second edition, 1858, p. 32, p. 222.

⑤ 前引盐岛仁吉编:《田口卯吉先生传》,第339页。

⑥ 末广重恭:《支那开化小史·跋文》,《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92页。

在体例和史观上都深受儒家史籍的影响,而且都以汉文编纂。^①虽有《大镜》《神皇正统记》《日本外史》等由私家撰写的和文史籍,但其中夹杂了许多神话故事和野史传闻。福泽批评道:“以往日本所有之历史,大致不外乎寻究王室之系谱、论君相有司之得失,或记录战争之胜负,无异于说书人口中之军中故事。罕有与政府无关者,不过为佛家之虚诞妄说而已,不值一观。概言之,无日本国之历史,仅有日本政府之历史。”^②为此,福泽早在明治五年前后就准备撰写一部日本通史,但是,他仅留下数页提纲便辍笔了。^③数年之后,比福泽年轻20岁的田口卯吉横空出世,推出了使他暴得大名的《日本开化小史》。

那么,田口是如何理解“开化史”的呢?1888年,田口在《支那开化小史》合刊本的跋文中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开化史乃社会之史。人类社会大理存焉。封建之崩,郡县之兴,专制政府之腐败,叛民之蜂起,文学之隆替,衣服饮食住宅之盛衰,皆非无因而发,且更为他者之原因。此乃大势也。”^④同年,田口又在他主办的《东京经济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概论》的史学理论文章,对“开化史”做了更为简洁的定义:开化史乃是“社会之史”,是“涉及社会全体之事件,比照记述其原因与结果”之历史。^⑤田口强调,历史是一个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其背后有着普遍的规律,而史家应该关心“涉及社会整体之事件”,如政府之兴替和社会组织之变迁,等等,从中揭示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规律。田口批评中国的史家们只记杀人战乱等“一时之变迁”,受其影响,日本的“旧史”也只记载战乱等史实。^⑥他在《日本开化小史》的汉文自序中写道:

历史者,古来之评也。古来非一世,世世非一人。治乱之形势,杂沓缤纷,若不能分析之,未必能免皮肤之见也。故史家之苦辛,不在于搜集历代许多之状态,而在于究尽其状态之所本也已。^⑦

① 《本朝通鉴》(共310卷,成稿于1760年)由林罗山父子编纂,仿照《资治通鉴》,采用编年体。《大日本史》(共397卷,成稿于1906年)由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主持编纂,仿照《史记》,采用纪传体,由本纪、列传、志、表四部分构成,列传中有《叛臣·逆臣》《孝子》《烈女》等篇目。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第216页。

③ 福泽谕吉:《日本的历史》,《福泽谕吉全集》第20卷,第85—87页。

④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91页。

⑤ 田口卯吉:《历史概论》(1888年),《田口卯吉全集》第1卷,第6页。

⑥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例言》,《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193页。

⑦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自序》(1877年,原文为汉文),《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页。

田口所说的“状态之所本”，也就是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规律。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巴克爾在《英国文明史》的《总论》中所特别强调的。田口不仅通过巴克爾的著作了解到史家应该重视历史“规律”，还了解到文明史首先应该关注社会之“人心”与“货财”。巴克爾认为：“历史学应该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人的行为乃是内在现象与外在现象二者相互冲突之结果，历史学家必须探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①《日本开化小史》合刊本出版后，田口在《日本开化之性质》一文中说：“余尝读英人巴克爾氏《英国开化史》之绪言，而得知该书在货财分配之上最为用力。”^②巴克爾所说的“内在现象”与“外在现象”，构成了田口《日本开化小史》的两个核心概念：“人心”与“货财”。《日本开化小史》开篇第1章就有“大凡人心之文野，与获取货财之难易密不可分。货财富则人心不野，人心文则货财必富。常保二者之均衡，则文运必盛，盖无例外矣”^③。通过巴克爾的著作，田口认识到“货财”与“人心”的相互作用是促使社会进步之动力。根据这一原理，田口指出“保生避死”乃人之天性，人类为保生避死而积累货财，以求衣食无虞。人类在抵御饥寒之后，会进一步追求舒适与华美。为达此目标而发挥智力，从而推动社会之进步。由茅屋而进于梁柱，由棉布而进于绢丝。“职业之分工、货物之生产、文运之进步”，正是人类社会进步之重要标志。^④概言之，田口通过西方的文明史著作，形成了对“开化史”的基本认知：“开化史”是社会进步之史，史学家应该从“货财”与“人心”两个方面揭示社会进步之规律。

那么，田口笔下的两部“开化史”是如何叙述日本和中国的历史的？从中又揭示了什么样的因果规律呢？

三、两部“开化史”的历史叙述

《日本开化小史》是田口卯吉以“货财”与“人心”之进步为线索撰写的一部日本通史。全书共6卷13章，记述了从上古到江户时代末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变迁。除了第1章《自神道之滥觞至佛法传来》兼涉政治与文化、宗教以外，其余12章按照今日的史学标准，可分为政治史（第2—6章、第9—10章、第13章）和社会文化史

① 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vol. 1, p. 23.

②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之性质》（1885年），《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137页。

③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9页。

④ 同上书，第83—84页。

(第7、8、11、12章)两部分。与明治时代出版的大多数历史著作不同,《日本开化小史》记述的既不是天皇的谱系,也不是历史上忠臣义士的事迹,田口笔下的日本历史,沿着“货财”(物质、社会生产)和“人心”(精神、文化)之进步这两条主线展开。田口写道,太古之人穴居巢栖,“茫然立于天地之间,与禽兽无异”。神武天皇从日向(九州南部)出发,率军一路东进,征服了大和之地(奈良)。所到之处,天皇向人民传授农耕和蚕桑技术,由此“国中之人皆成务农之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的工匠、商人、学者带来了器物、纺织、文字和学术。随着“货财”之发展,神权思想深入人心,由此诞生了“神教政府”。然而,佛法传入日本后,上自天皇下至大臣皆皈依佛门,导致天皇大权旁落,藤原氏专擅朝政。源、平二氏之争开启了武人割据之风,镰仓、足利幕府皆为武人之天下。德川幕府成立后,由于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聪明正直”,且长于控制诸侯,而有200余年“太平时代”。^①幕府末期,外敌当前,德川幕府虽长于控制诸侯与人民,但无力联合国内诸藩共御外侮,因而发生了明治维新。^②

《日本开化小史》全书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第7、8、11、12章。这4章记述了从镰仓时代至江户末期大约600年间“货财”与“人心”之进步。田口写道,日本上古无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文学”随之诞生。田口所说的“文学”,乃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之学,包括历史、小说等“以文章形式所表现之物”。^③起初日本人以汉文记述本国的历史,随着日记体等书写文体的发展,和文逐渐取代汉文,成为日本人撰写历史、小说的主要语言。进入江户时代后,从饮食、房屋、衣服、发饰、公共浴室、书画、印刷、戏剧、木屐、望远镜,到文学(小说、历史)、医学、儒学(朱子学、阳明学)、经济学、和学、狂言、天文学等等,“货财”和“人心”都有了长足发展。田口特别强调,衣食住行和人文、艺术诸领域之进步“既无政府之保护,亦未借外国开化之助力,皆为日本社会内在之进步”。在《日本开化小史》第12章的末尾部分,田口写道:

据上述事实可以推知,开化之进步乃为社会之特性。王朝之时,以门第论

①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③ 同上书,第55页。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在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前后才随着“日本文学史”的出现而逐渐普及。参见铃木贞美:《日本“历史”之历史——作为一个程式话语》,《日本研究》第35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纪念特集号》,2007年,第380页。

贵贱，弊害甚多。各地封建势力奋起而求自由；足利氏之季世，陷入封建战国之祸乱，则聚而求太平。太平之世，文学技艺，凡百之事，皆有进步，而求终身之快乐。此乃社会变化之常理，英雄豪杰之所为者，或加速或延缓其势而已。呜呼，以此理当可推察我国之前途也。^①

田口将日本历史上的“货财”与“人心”之进步，纳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进程之中：从奈良、平安王朝以门第论贵贱，到封建制下追求自由和文运之“开化”；从室町幕府之封建战乱，到德川时代之太平盛世。

与此不同，《支那开化小史》向读者展示的是另一幅历史图景。^②《支那开化小史》全书共分15章，以“封建一郡县”为主线，勾勒出自远古至明末的历史大要。田口写道，太古之人结绳记事，伏羲、神农时人民“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舜行中央集权，启以后行“世袭政治”，但仍为“氏族割据”。春秋时代为“封建分裂”之世，周天子无力控驭诸侯，秦国地理易守难攻，“国内整肃，无优柔之风”，故能一统天下。田口认为，秦之失败在于待民苛刻，重徭役、重刑法、行苛政而失天下之人心，“皆因始皇心胸狭窄”^③。他批评秦始皇行中央集权，限制地方权力，称赞汉高祖分封同姓，行封建制。他认为刘氏一族免为吕后所灭，“实为封建之功”。但封建之制导致“七国之乱”，东汉以后400年间“纷扰混荡”，“一片黑暗”。唐代国力虽强，文物胜于前代，“然专制政治固有之弊，非明君贤相以智略可长久制驭者。盛时已存弊端。秦以降，专制政治形体完备，故虽有明君贤相，绝无

①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106页。

② 田口在该书的跋文中说，此书于繁忙之中抽空写就，每成一卷便寄给末广重恭、岛田三郎、小池靖一三位友人，请他们对书中的内容进行评论。三人在书中留下了许多赞扬之词，但也不乏批评之语。田口还在跋文中说，为了撰写这部著作，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史书，但“错综缤纷，如临海数沙，无从下目。独有赵鸥（瓠）北沙中拾珠，余之劳力仅为概括珠玉，察其大势，以丝缀珠而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91页）。赵瓠北即赵翼（1727—1812年），是清代历史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廿二史札记》（初刻于1800年）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齐名，并称清代乾嘉历史考据学的三大名著。田口在友人末广重恭家中偶然看到《廿二史札记》，随手翻阅后大为感叹，称“此书可作支那开化史之材料”（福田德三：《解说》，《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3页）。后人据此认为《支那开化小史》受《廿二史札记》的影响。其实，二者在写作风格和史学思想上有很大不同。《廿二史札记》是一部读史笔记，内容精深但缺乏体系。作者比照历代正史，指出了正史中的许多矛盾和错误之处。而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虽然有一些引用《廿二史札记》之处，但它是一部简要论述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通史著作，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也与《廿二史札记》完全不同。

③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12页、第219页。

在此范围之外而有新法者”^①。他称赞朱元璋仿行汉制,分封诸子为藩屏,但太祖抔土未干,燕王即起兵谋反,有明一代依然“蒙受专制政府之种种弊害”^②。田口在全书末尾的《总评》一节中写道:

据上述事实可知,支那国之人民常苦于政治之弊害。周代以前数千年,沉于封建乱离之祸;秦以降二千余年,沉沦于专制政治之腐败时代。支那国之人民至今尚未发现预防此种弊端之制度。封建乱离之祸害不堪忍受之时,则以专制政治一扫之;专制政治之腐败不堪忍受之时,则以叛乱分裂一扫之。支那国人民之历史,不过此数事之反复而已。和平之时,必有腐败,使人不忍见之;乱离之时,必有杀戮,使人不忍听之。脓汁与鲜血,充斥读者之耳。和平之时,非无诗歌、文章、经学之发达,然皆为慰藉贵族隐士闲散之物,不值一观。政治权力强大在上,财力枯竭在下,故文物无以发达。四亿人口之邦,其文运何以至此?呜呼!支那国之人民自苦久矣,何不于专制政治之外,别开生面,速达真正之幸福哉?^③

在田口的笔下,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行郡县则受“专制”之苦,行封建则有“乱离”之害。由此,整个中国史成了一部看不到“开化”的黑暗之史。

比较两部“开化史”,不难看到,田口笔下的日本历史是一部从野蛮迈向文明的进步史,而中国历史却是一部累于“专制政治”而失去“开化”动力、不符合人类普遍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

同为“开化史”,为什么《日本开化小史》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日本历史“开化”之进程,而《支那开化小史》却是一部缺失“开化”的历史呢?秘密就在两部“开化史”的文本之中。

四、“开化史”视野中的中日之“开化”

1891年,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合刊本出版3年之后,东京地方法院受理了

①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54页。

② 同上书,第286页。

③ 同上书,第286—287页。

一起版权诉讼案。原告是《东京经济杂志》主笔田口卯吉，被告是第一高等学校历史教师明石中和。田口指控明石在同年5月出版的《新体支那史》（东京：大仓保五郎刊行）中盗用了《支那开化小史》的创意。作为证据，田口向法庭递交了两书雷同部分的对照表，表中列举出明石书中近20条剽窃之处。一个月后，法庭判定明石有罪。然而，明石当即对法庭的判决表示不服，提出上诉。^① 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在这一年刚刚通过日本政府文部省的教科书审查，被批准作为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可以想见，舆论对此案的关注非同一般。

其间，田口在《东京经济杂志》上发表《读〈新体支那史〉》一文，历陈《支那开化小史》“依所记录之事实，观社会之大势，究明因果之关系”，它有别于以往的编年史，是一部新颖的“开化史”著作。田口说自己之所以不惜与明石对簿公堂，乃是为了“争思想之权利”^②。对此，明石针锋相对，批评田口《支那开化小史》囿于中国历史上之政治变迁，名为开化史，实为政治史；而《新体支那史》除了记述中国历代政治变迁之外，“于外交之关联，开化之事实，无不一一记述”。在二审中，法庭认可明石的主张，认为两部著作编纂方法完全不同，不涉及版权侵害问题。^③

翻开明石的《新体支那史》，读者不难发现，无论从结构到内容，该书都与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大不相同。该书按照欧洲史书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秦汉以前）、中古（西晋至南宋）、近代（元、明、清）三个时期，每个时期辟专章记述该时期有关“开化”的内容。如《太古之开化》一章记述了三代之政治、礼乐、兵备、风俗、人口、食物等诸方面的发展状况。书中记述了中国各个时期“开化”的历史。正如明石所言，《新体支那史》更接近文明史。明石批评田口的《支那开化小史》徒有“开化史”之名，实为政治史，可谓其言不虚。

田口和明石的诉讼在一个多世纪前既已尘埃落定，对于笔者而言，与田口《支那开化小史》中脱落了什么相比，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脱落的问题。

其实，在《支那开化小史》陆续刊行期间，田口的好友岛田三郎就在该书第4卷结尾部分用汉文写下了一段批语：“浏览到此，通考前篇，本书专论治乱之大纲，不记琐屑之事，所异于寻常支那史，实在于此。然所记特在政治上，而不涉一般社会

① 关于此案的背景及审理经过，参见甘露纯规：《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伪版诉讼事件考——以“创意”剽窃为中心》，《日本出版史料》第9号，2004年。

② 田口卯吉：《读〈新体支那史〉》（1891年），《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93页。

③ 前引甘露纯规：《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伪版诉讼事件考》，第11页、第16页。

之事,称曰开化小史,恐名过其实,改为政纲小史,如何?敢质诸田君。”^①可见,在《支那开化小史》成稿之前,岛田已经察见田口两部“开化史”在结构上有差异,发现《支那开化小史》偏重于政治史,缺少“开化史”应有的衣食住行、社会风俗、学术思想等内容。对此,田口在《支那开化小史》的跋文中进行了反驳。他说,许多人误认为开化史就是文物变迁之历史,其实不然,“开化史乃社会之史”。人类社会中有“大理”和“大势”,西洋和中国之“大势”不同,“西洋之大势,多有文物进步之元素,支那则多有政治权力之元素”。^②

1875年,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学者中村正直(1832—1891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支那不可侮论》的文章,针对当时趋鹜西洋、轻慢中国的风潮,指出中国是发明汉字的国度,其人民具有“思想之才”,中国“书籍浩繁,为东方之冠”,中国“发明有用器具甚多,乃本邦所不及也”,等等,批评时人刚从欧美学到一点皮毛知识,就对中国采取轻侮态度。^③在田口《支那开化小史》问世之前,“停滞”“专制”等关于中国的种种否定词,早已出现在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等欧洲人的著作之中^④,并且在明治初年通过福泽谕吉等人的启蒙文字传入日本。^⑤那么,田口是不是像中村所批评的那样,刚学到一点西方文明的皮毛,就认为中国“无开化可记”呢?《支那开化小史》难道是田口削足适履地按照欧洲人关于中国的“停滞论”模式

① 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291页。

③ 中村正直:《支那不可侮论》,《明六杂志》第35号,1875年;山室信一、中野目彻校注:《明六杂志》下卷,岩波书店,2009年,第175—181页。中村曾经就学于德川幕府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师从田口的曾祖父佐藤一斋。后被幕府派往英国留学。他编译的《西国立志编》与福泽的《文明论之概略》被公认是明治时期最著名的两部启蒙著作。

④ 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65页。)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多处将中国的“专制政治”“恶政”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野田良之等译,东京:岩波书店,1987年,第176页、第260页)。大野英二郎的《停滞的帝国——近代西洋的中国形象变迁》(东京:国书刊行会,2011年)对“中国停滞论”在西方语境中的形成与变迁做了详细而系统的分析。

⑤ 福泽谕吉在1869年出版的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和人文知识的普及读物《世界国尽》(该书被文部省指定为小学地理教科书)里写道:“支那自唐虞以来,重仁义、讲五常,人情淳厚,四千年(原文如此)声名远扬。然不思文明开化,风俗日衰。不修道德,不求知识,唯我独尊,不知天高地厚。暴君污吏,大权独揽,以上压下,恶政难逃天罚。”福泽谕吉:《世界国尽》,《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1869年,第593—595页。

撰写的一部中国历史吗？其实不然。如果比照田口的两部“开化史”就会发现，田口在《支那开化小史》中留下无“开化”可记的空白，与他在《日本开化小史》中对来自中国之“外来”要素的排斥，二者其实是互为表里之关系。

通读《日本开化小史》便不难发现，田口在涉及日本历史上学习中国文化、制度等内容时，几乎都是以否定的笔触来记述的。田口认为，在奈良、平安时代，大和王朝模仿唐制而颁布的律令制度不合日本的国情，皇室权贵模仿中国文化，导致“文弱之风逐渐蔓延”，“游惰之气增长”。日本接受隋唐文化之后，政治由质朴变为“华美骄奢”，庙堂之上滋生游惰之风。“颁布律令格式，编撰历史，使政府规模庞大，人民与政府之间悬隔，而朝廷游惰之气益盛。”他认为，统治者之所以会变得“柔弱”“骄奢”和“游惰”，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关。人心渐趋柔弱，导致天皇大权旁落，藤原氏独擅大权。连武士建立的室町幕府，也因浸淫于京都文化，与皇室一样染上了“京洛文弱之气”。^①

田口肯定汉字输入对日本之贡献，但否定日本人用汉文撰写自己的历史，因为“用晦涩难懂的外国汉文”来记录日本古代丰富的语言，这本来就不可能成功。^② 田口批评从《古事记》《日本书纪》到《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等受中国史学影响、用汉文编纂的史书“仅为年表，而非历史”^③。不过，田口认为晦涩的汉文并未能长期阻碍日本“文学”（历史、小说等）之进步。平安后期藤原氏执掌政权，11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出现了许多“自发之进步”，首先是10—12世纪在语言、文学、史学等领域的变化。田口欣慰地写道，在10世纪，日记体这一比较自由的文体取代了汉文，“以日本之表现方式撰文之风逐渐普及，真乃日本文学之幸也”。11世纪出现的用和文撰写的《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等著作，“实乃我日本人心中之曙光，仿佛拨开阴霾见晴天”。而成书于12世纪、用介于和文与汉文之间的新文体（田口称之为“日本文”）撰写的《荣华物语》和《续世继》，乃是“以日本文记载历史之滥觞”。^④ 成书于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更被田口誉为江户以前日本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作”。除了这些用和文撰写的文学、史学作品之外，田口对镰仓幕府于1232年制定的《贞永式目》（又称《御成敗式目》）也大加称赞，因为该法律乃是“按

① 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17—19页、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

③ 同上书，第37页。

④ 同上书，第59—60页。